

永不褪色的忠诚

■贺 猛

1941年除夕,马庄的乡亲们正在准备年夜饭,日军一个中队携伤兵200余人突然进村抢掠。正在休整的郭玉谦所在连队立即投入战斗。他记得特别清楚,被日军点燃的那个草垛烧红了半边天,老乡家的年货被装上大车。他带着几个战士迂回到日军侧翼,连续投出3枚手榴弹。轰隆的爆炸声后,他们趁机冲上去夺回物资。眼看胜利在望,郭玉谦身后传来一声闷哼——同村参军的王振兴被子弹击中胸口。他背起战友往后方跑,还没到救护所,王振兴的身体就已经凉了。

那天夜里,郭玉谦一边擦枪一边流泪。连长走过来拍拍他:“振兴走了,但他守住的是乡亲们的年夜饭。”第二天,乡亲们执意要把抢救回来的猪肉送给部队,郭玉谦和战友们悄悄把肉放回老乡家的灶台上。

二

1942年5月,冀中平原上掀起阵阵腥风血雨。日军调集5万余兵力,对八路军根据地展开地毯式“扫荡”。

一天夜里,通信员带来的消息让郭玉谦肝肠寸断:他的父亲被日伪军抓去修炮楼时,因为偷偷给八路军送信,被敌人活活打死。郭玉谦蹲在麦田里,把脸深深埋进粗糙的手掌,泪水从指缝间滴入干涸的土地。连长破例批准他回家奔丧,他却摇了摇头:“现在回去,会给乡亲们惹祸。”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郭玉谦更加勇猛。北阳堡之战,他带领尖刀班突袭日军据点,亲手击毙3个鬼子;凤凰村遭遇战,一个鬼子从背后将他扑倒,两人在窑顶滚打,郭玉谦抓住机会,将敌人从5米高的砖窑推下……

残酷的消息接踵而至。1944年初秋,部队转战至邯郸附近。一天早晨,指导员神色凝重地找到正在擦枪的郭玉谦,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大

哥在马车站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二哥在济南的一次战斗中负重伤,落下残疾。那天的夕阳特别红,郭玉谦独自坐在村口的碾盘上。大哥参军前是个教书先生,总爱说“位卑未敢忘忧国”;二哥参军前是村里最好的木匠,给八路军做过许多假地雷……亲人的面容浮现脑海,郭玉谦摸着腰间的驳壳枪,深刻理解了什么叫“国仇家恨”。

“玉谦,挺直腰杆!”连长不知何时站在了他身后,“你哥走得光荣,咱们得接着打,打到胜利那天。”郭玉谦重重地点头。

郭玉谦记忆最深的,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护送伤员的情景。1942年反“扫荡”最艰难的阶段,部队被迫转移至冀鲁豫根据地。数百名伤员全靠老乡们夜里用独轮车运送,硬是跋涉600多里到达山东省冠县。“没有乡亲们,八路军活不下去。”这句话,郭玉谦说了一辈子。北阳堡战斗后,他们截获日军12辆卡车的物资,全部发给乡亲们。

三

1950年,青岛,夏日阳光照耀着碧蓝的海面。27岁的郭玉谦整了整崭新的海军制服,抬头望着港湾里的军舰,心中既兴奋又忐忑。打了十几年仗,他开始学习全新的战斗方式了。

“报告教官,什么是口径?”在原海军海岸炮兵学校的第一堂课上,郭玉谦认真地举手提问。晚上,他在油灯下抄写教材,在笔记本上画军舰和火炮的构造图。3个月下来,他的课本磨出毛边,成绩让人刮目相看。

1963年,郭玉谦被任命为原海军503大队大队长。面对新型导弹装备,这位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兵拿出了当年排刺刀的劲头。他带着技术骨干通宵达旦地研究,有一次为了琢磨透一个技术参数,36小时没合眼。警卫员小张心疼地劝他休息,他说:“打仗时3天3夜不

睡都挺过来了,这点困难算啥?”

1977年,郭玉谦就任原海军第二炮兵学院副院长。在导弹打靶现场指导训练,他总能敏锐地指出问题:“小赵,刚才的仰角还差0.5度。”年轻的教员们暗暗佩服,这位文化程度不高老兵,硬是靠勤学苦练掌握了现代军事科技的精髓。

四

1985年,郭玉谦正式离休。他身上的军人作风丝毫未有减退。每天早晨6点,他家准时亮灯,被子永远叠成标准的“豆腐块”。

郭玉谦的长子郭涛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申请入党时的情景。当时他在部队表现优异,本以为父亲会很高兴,没想到父亲严肃地问:“申请入党,你是靠自己的真本事吗?”得到肯定答复后,郭玉谦才露出笑容:“记住,共产党的门,只对真正优秀的人敞开。”

次子郭一丁当年想请父亲帮忙,给自己调个好单位。“胡来!”郭玉谦拍案而起,“我参加革命时连裤子都穿不上,你现在倒想走后门?”那是子女们第一次见父亲发那么大火,自此再也不提“特殊照顾”。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97岁高龄的郭玉谦坚持要捐款。他让儿子帮忙从积蓄中取出两万元,颤巍巍地在信封上写下“一名老党员的心意”。每当干休所工作人员上门送防疫物资,郭老必定让儿媳准备姜汤,和老伴儿一起走到门口致谢。

“尊重人、帮助人”是郭家最朴素的家训。从老伴儿给工作人员递去的一杯热茶,到儿女们双手接过送上门的饭菜,这条家训早已融入这个大家庭的点点滴滴。

潮水日复一日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仿佛在诉说一位老兵永恒的忠诚——对党忠诚、对军队忠诚、对人民忠诚。这片赤诚,穿越烽火、映照初心,永远闪亮在岁月长河中。

一瓣心香

又到芒果收获的季节,小区里的芒果树挂满绿中透黄的果实。微风吹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芒果香气。还不时有芒果掉在地上,或被人拾起来,或被鸟儿啄食、虫子啃咬……看着眼前的一幕,我想起那年部队驻训时与一棵芒果树邂逅的情景。

那年盛夏,我担任某部政治部主任,随部队到野外驻训。来到清源山脚下,我们借住在兄弟部队的一个旧仓库营区。待部队安顿好之后,我到驻地周边检查安全情况。走着走着,在仓库一侧的围墙内,我发现一棵芒果树从围墙外面伸展进来不少枝条。这棵芒果树高10多米,枝丫虬曲苍劲,枝叶繁茂,枝条上挂满即将成熟的芒果。

顿时,一个问题跃入我的脑海:我们入驻旧仓库后,加固了围墙,设置了岗哨,这棵树的主人如何进来采摘芒果?成熟的芒果怕摔、怕碰、易损伤,可别因为我们驻训影响群众的收入。

下午,我让负责群众工作的王干事到村子里走访,了解到这棵芒果树的主人叫林兴旺,村里的人都叫他阿旺。王干事按照我们研究的意见告诉阿旺,只要他想进院子里摘芒果,在门口岗哨那里登记一下即可。听罢我们的意见,阿旺连连摆手:“不打算的,我家芒果树多,那棵树上的果子就给你们采摘啦!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王干事说:“部队有纪律,我们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你想想院子里采摘,就在门岗报备一下。”

王干事回来后,向我汇报了走访的情况。我暗自猜度,阿旺十有八九是不会进营区摘芒果的,我们得有第二个方案。我和王干事商量后,把看护、收获芒果的任务交给了警卫班。

警卫班谭班长领到任务后,当即带人来到芒果树下,与两名视力极好的战士清点芒果:“1个、2个、3个……”他们默默地数着。各自数了3遍后,得出的结论一致:墙内枝条上的芒果共188个。谭班长说:“从今天起,我们班要看护好这些芒果,不要让它们受损。”“是!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当天晚上,谭班长主持班务会,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如何看护好这些芒果。谭班长先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当年辽西战役期间,正是苹果成熟季节。官兵们行军、作战穿行于苹果树下,没有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毛泽东同志夸赞说:“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那是人民的苹果。”以前听了多遍的故事,那天晚上

一百八十八个芒果

■向贤彪

再听,大家感到格外亲切、格外有针对性。随即你一言我一语,围绕如何看护芒果出了不少好主意——在树下堆积厚厚的稻草,成熟的芒果掉下来就不会摔坏;当天从树上掉下来的芒果,及时派人送到果树主人家里……

在此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树上的芒果由青变黄,散发出浓郁的果香。一阵风刮过后,总有一些掉下来,战士们及时捡起来送到阿旺家里。班里的月志上,清晰地记录下捡拾芒果的数量。7月17日18个、7月18日19个……7月25日31个、7月26日45个,直至7月30日,188个芒果一个不少地完璧归赵。

每一次送芒果“回家”,阿旺都要热情地让战士们品尝。但战士们严守纪律,一个都没有吃。阿旺颇为有心,录下了战士们拉歌时高唱的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自家出售芒果的摊位上播放。他逢人就说:“解放军纪律好,不但不吃我的芒果,还想方法法帮我看护。”

国防纪事

一

湖北省随州市古称“汉东之国”。这座城市曾深藏着炎帝神农的耒耜桐琴、春秋战国的编钟鹿鹤、唐宋大家的金声玉振、大夏王朝的风起云涌,当然还有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游击的苦难辉煌。

也许是30多年军旅生涯累积的习惯,相比深藏于斯地的古代灿烂文化,我更愿意追溯新四军第五师的历史源头。翻阅《新四军战史》,当我读到新四军第五师“长期远离军部、孤悬敌后”几个字时,心潮翻涌,脑海顿时展现第五师官兵在日寇、敌顽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苦心孤诣建功立业的历史画卷。

提起新四军第五师,随州本地人会介绍一个地名:九口堰。这是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镇的一个村落,那里有一处明清时期古建筑——孙家大院,第五师当年即在此宣告成立,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革命旧址纪念馆也坐落于此。

地名从来都是一个浓缩地域文化、承载精神信仰、彰显历史遗迹的符号。比如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遂川、永新、酃县、茶陵等地名,就镌刻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的光辉足迹。我由此相信,九口堰也见证了新四军第五师的创建和发展。可是,当我查遍战史中关于新四军第五师的成长轨迹和大小战斗,没有找到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九口堰”。

《新四军战史》由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6月公开出版。按说,九口堰这一地名的出现远早于编纂时间,战史在叙述新四军第五师包括其前身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创建抗日根据地时,不可避免会提及一些地名,应该不会遗漏九口堰。为此,我曾询问当地文化界的友人,他们也一头雾水。这更加激起我寻幽探源的历史兴趣。

我将《新四军战史》中与第五师标志性事件相关联的地名一一梳理标注:1939年11月,第五师前身——豫鄂挺进纵队在应山以北的四望山统一整编,随后至京山马家冲。12月5日,日军第13师团一部1500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冲击马家冲,纵队胜利突围,安全转移至京山八字门。1940年3月,纵队在地处鄂东礼山、孝感两县边界的大小悟山与顽军程汝怀部激战,击溃第19纵队第3支

队等部2000余人,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边区党政机关及纵队指挥机关随之进入这一地区的黄家冲和姚家山”。6月5日,国民党第7军张淦的两个师和程汝怀部两个纵队2万人分路进击,纵队被迫撤出大小悟山,分别向赵家棚、大山头、八字门转移……

四望山、马家冲、八字门、黄家冲、姚家山、赵家棚、大山头……这些质朴的地名宛若一颗颗珍珠,串起第五师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而“九口堰”缘何不见踪迹?

二

从常识的角度看,九口堰的地名不见于战史,极有可能是地名的历史称谓异化或当时行政区划划分不同。九口堰或许只是当地人对自己地貌的概括,比如十里棚子、三岔口之类。九口堰大约就是九口堰塘的代称。

据当地人介绍,九口堰地名的出现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叫孙家大湾。此地以前的确有一些大小相连接的堰塘,其中九口堰塘较大。站在山顶俯瞰,九口堰的一片水系如同一条健步行走的虬龙,显示出铿锵澎湃的生命活力。至于为什么从孙家大湾改为九口堰,当地人更是语焉不详。

九口堰地名来源含混不清,地理方位却具体明确。我找来一张大比例地图,对照战史勾画历史脉络,以红蓝铅笔标明敌我态势,九口堰的军事要冲价值一目了然。

九口堰位于白兆山脉中段东北麓,白兆山是大洪山向东延伸的支脉,地跨随县、安陆、京山等县市,在抗战时期是控扼随枣走廊的东大门。新四军第五师就是我党打入敌后的一枚楔子。

1939年1月,新四军派遣一支160人的队伍从河南竹沟南下豫鄂边区,开展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并在四望山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支队伍就是新四军第五师的源头——独立游击大队。独立游击大队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不断会合当地抗日武装,聚少成多,渐有规模。当年6月26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在湖北京山养马畈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贤妻良母”的女革命家陈少敏任政治委员。

风雨如晦的岁月,步步惊心的境地。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很难想象,孤立无援、时刻面临生死抉择,坚持活下来已属不易,如何还能与日伪作战,与敌顽

周旋,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力掀反共浪潮,鄂中地区日伪敌特遍布,我抗日力量一有风吹草动,敌伪便集合兵力“围剿”。当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进入京山崖家冲、上老冲一带时,敌伪即得知消息,从京山坪坝、宋河、安陆等地兵分3路分进合击。伪军进至冲口槐树湾时,被我哨兵及时发现,鸣枪报警,李先念率部突围,躲进山洞,藏身5日才得以脱险。

多年以后,李先念重回故地时说:“那时生存发展压力很大,我从30多岁就开始失眠。睡不着觉就爬山,爬一二十里,爬完山天就亮了,洗把脸就开会研究敌情。”

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屡遭敌袭,随即转战随南,在白兆山一带对敌伪打击、驱逐,逐步扫清白兆山外围,同时整编扩大队伍。

《新四军战史》《新四军文献》等正史多次提及的“随南”,只是一个大体方位。九口堰这一历史坐标,则多出随州市新四军研究会整理的第五师老领导的口述。当然,口述历史一旦与遗迹实物相印证,同样具有说服力。

三

被围困的日子无疑是艰难困苦的日子。国难当头,即使处境窘迫、步履维艰,新四军指战员也要坚持抗战直至胜利。

尽管如此,国民党顽固派仍想拔掉新四军这根心中之刺。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枪声惊醒山林,震惊中外。皖南事变后,遵照中央关于迅速组建新四军第五师的指示,李先念于1941年4月5日发出《率新四军第五师全体将领就职通电》,宣告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4月10日,第五师机关、驻白兆山的第十三旅和第一纵队指战员,在孙家大湾前河滩上召开整编誓师大会,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第五师活动于武汉四周,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区,如果没有听党指挥的忠诚、抗战必胜的信念、不怕牺牲的勇敢、与敌斗争的顽强,不可能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在第五师成立前后近3年时间里,孙家大湾始终是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的指挥中枢。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孙家大湾就在如今的九口堰村。

时任第五师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回忆说:“1939年冬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无论是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还是新四军第五师,我们的司令部一直驻扎在两

个地区:在京汉铁路以西,住在随南白兆山,包括京山的大小花岭;在京汉铁路以东,就住在鄂东的大悟山。特别是从1939年冬到1942年6月,对第五师建设起着重要作用的关键时期,我们纵队和第五师的司令部一直设在白兆山的中心地带——洛阳店的九口堰地区。”

白兆山方圆百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九口堰深入腹地,进可扼要道,退可避深山,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正因如此,敌顽屡屡进犯。当时,李宗仁集重兵进攻鄂边区,先后出动12个师达10万之众,对第五师发动全面“清剿”。白兆山抗日根据地被敌“蚕食”,新四军第五师分布各地,驻九口堰机关和部队处境更趋艰难。为保存力量,1942年6月,第五师不得不撤离此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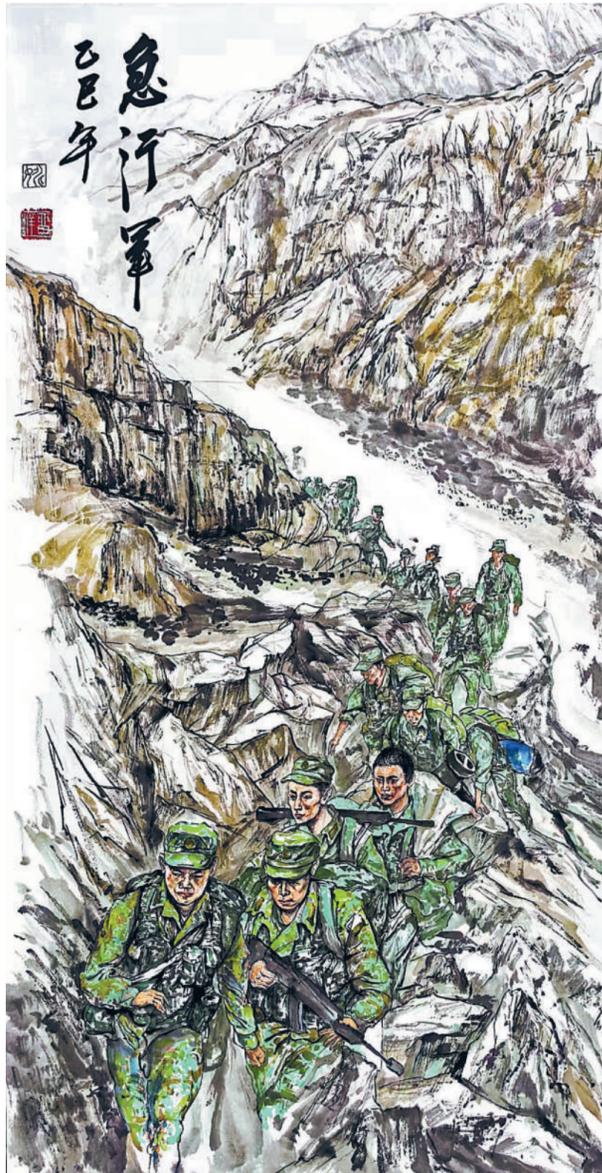
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革命旧址纪念馆展示的一份作战文书称:“自顽军开始向我大举进攻以来,我曾集结主力数度奇袭,企图以各个击破的战术,打破此次‘围剿’。每次作战虽获小胜,但因各种原因,均未实现原定计划,伤亡减员已达千人,后方补给亦极困难。”其时,敌强我弱,为避其锋芒,第五师审时度势奉命战略转移的举措是正确的。

1942年7月21日,因新四军军部和第五师联络中断,不便指挥,中央军委根据新四军军部建议,决定第五师由军委直接指挥,建制仍归新四军。第五师除留一个旅作主力外,其余均地方化,建立5个军分区。

第五师在一次次胜利和失利中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两年后,第五师挥师随南,一举收复白兆山根据地,第五师司令部、政治部又一次进驻孙家大湾。

第五师再临九口堰,这一天是1945年4月11日。按照第五师领导人传记和回忆录中的说法,第五师成立后指挥机关驻扎在九口堰的时间最长。当然,老同志口中的九口堰,只是一个今日方位名词。对人们而言,无论叫什么名字,那片热土都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它如同夜空中明亮的星辰,闪耀着让人不能忘怀的历史光辉。

正当我为九口堰这一地名困惑不已时,与一位学者讨论文化话题其间,我顺便提起九口堰。这位学者说,早些年曾听过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丁凤英的讲谈,记得她提到九口堰地名的来源——丁凤英一行曾拜访过新四军第五师首任师长李先念。李先念对她讲,他还记得司令部驻地那个湾子有九口堰塘。随后,李先念便拿起笔在一张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九口堰”。



急行军(中国画)

姚留洋作